

西双版纳傣族历史上的三次文化变迁及其启示

黄泽, 洪颖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云南大学 思想战线编辑部, 云南 昆明 650091)

摘要: 西双版纳作为我国唯一的傣族自治州, 以傣泐支系为主的傣族已在此定居两千年以上, 并历经三次文化变迁, 经过原生文化(稻作文化、古越文化、原始宗教文化)、次生文化(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次生文化(全球性普同文化)的叠加融合而形成复合型文化, 其文化融合、变迁、适应机制已成为西双版纳傣族文化的内在特质, 将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进程的融通中发挥影响作用。

关键词: 傣族; 文化变迁; 文化适应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西双版纳傣族作为现今“保存古越人文化最多的百越后裔”, 其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且形貌独特, 享有“贝叶文化”之誉, 堪称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枝奇葩。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 西双版纳傣族历史上曾历经三次重大文化变迁, 在长期、反复的文化适应与重整过程中, 造就了成熟从容、审慎理性的文化变迁适应机制。本文简述其三次文化变迁概况, 并集中分析贝叶文化作为复合型文化所内含的文化适应机制, 期望能对认识当代西双版纳傣族文化的变迁与发展提供一些有益启示。

一、三次文化变迁

民族史研究表明, 百越族群古代分布地与东亚半月形“稻作文化”分布地大致重合, 北缘约在印度阿萨姆邦安宁河、雅砻江流域、金沙江流域、怒江流域到湖南、浙江一带, 且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处于逐渐南下西进的流徙过程。据西双版纳、德宏等地傣族口碑传说, 傣族历史上曾发生过较大范围的迁徙, 古歌谣《沙都加罗》中也说到傣族先祖从“冷森林”到“热森林”的迁徙, 西双版纳则流传着叭阿拉武率族人追踪金马鹿寻找乐土来到版纳的传说。从考古文化的对应关系来看, 铜鼓、印纹陶器、有段石铤、有肩石斧等与百越族群有渊源关系, 而古百越文化的几十项文化因子中现今唯有西双版纳傣族保存最多。

傣族史籍中记载的“叭桑木底”时期, 属原生型傣族文化形成时期, 即第一次文化变迁时期, 实现了从纷杂无序的采集狩猎文化向初具体系的原始农耕文化的转型及升迁。其特征为建立了成熟稳定的稻作农业体系, 从采集渔猎发展到定居农耕、建寨, 确立寨神勐神信仰体系, 并具有以下百越族群后裔泰傣掸老民族的共同文化特质: (1) 喜居湿热江河平坝及河谷地带; (2) 使用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铤等新石器时代典型器物; (3) 创制夹沙、夹炭粗陶和晚期的彩色印纹陶; (4) 精于青铜冶炼并铸造、使用铜鼓; (5) 具有共同的金齿、银齿、黑齿之俗; (6) 使用大象耕田、作战、运输; (7) 普遍居住干栏式建筑; (8) 种植水稻, 喜食糯米; (9) 使用木棉纺织, 创造傣锦; (10) 服饰采用筒裙、笼基; (11) 长期保持椎结发式; (12) 文身习俗; (13) 男女同川而浴; (14) 善于造船用舟, 龙舟竞渡; (15) 喜食水产品 and 食生食酸; (16) 擅长古老的捕鱼术; (17) 精于水田耕作, 善用耕牛; (18) 保持传统制陶术; (19) 喜爱佩带金银首饰及用品; (20) 喜食槟榔, 宴以待客; (21) 崇尚斗鸡、斗鸟等娱乐活动; (22) 信仰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 形成特有的寨神勐神崇拜。

叭桑木底时期是奠定傣族传统文化根系的时期。《沙都加罗》讲述了傣族先民由跟随猎首沙罗过着依赖居地动植物资源而游居不定的生活, 过渡到在叭桑木底领导下结束群队间的

猎食纷争而定居耕作，是为第一次文化变迁的民族记忆。叭桑木底作为农耕初期的代表人物实为部落联盟首领，他率众奋力开创农耕新时代而被视为农耕英雄，对后世影响深远。傣文史籍认为叭桑木底是整个傣族远古社会的象征，将傣族的原始社会泛称为桑木底时代，人们也把傣族古老的规矩、制度称为桑木底规矩或桑木底制度，把最原始的竹楼称为桑木底房。第一次文化变迁时期比较稳定的社会生活特征主要是：（1）各氏族部落普遍地从穴居、巢居进入定居（傣文史籍《沙都加罗》记述了先民跟随叭桑木底盖房建寨、建寨建勐的过程）；（2）从采集、狩猎进入农耕（傣文史籍《勐泐王族世系》记述了农耕英雄叭桑木底的业绩）；（3）从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群婚制，进入一夫一妻制（傣文史籍《巴塔麻嘎捧尚罗》对此有所描述）；（4）傣族原始宗教从诞生、发展到趋于完善成熟，自最初的尊奉猎神沙罗到崇拜与农耕经济相联系的谷神、水神、山神、树神、天神、地神，再到祭拜佑护社会生活秩序的房神、家神、寨神、勐神，形成了完备的神灵崇拜系统；（5）社会组织结构从分散的血缘性的家族、氏族，演化为地域性的农村公社，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大为发展，制度文化开始形成。[1]这些特征是西双版纳傣族原生文化的主要构成。一般认为西双版纳傣族为迁入的越人族群与原住民的部分越人融合形成，年代应在公元前，因无文字记载，对该时期的民族形成、文化发明只有口传记录。

叭桑木底时期傣族原生文化的形成，经历了原有文化因子在不断自我调适基础上适应生态环境及人类生存需求而进行文化层次自我擢升的漫长历史过程，属自然进化、传递、选择的结果，反映了世界各地原住民族独立发展创造本土文化的普泛规律。

而第二次文化变迁则以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这一次生文化传入滇南、滇西南广大傣族地区，贝叶文化的成形、传承为标志，公元3、4世纪或公元前后为佛教传入西双版纳的第一阶段，7、8世纪至13世纪为第二阶段。自此，西双版纳傣族文化从口传文化、无文字民族文化进化到了典籍文化、文字文化阶段。贝叶文化的核心是以巴利文为基础创制的老傣文，载体为贝叶经，记载内容则反映了贝叶文化的复合性特征——包括了南传佛教经籍和傣族高僧大德阐述佛法的见解两部分，大量棉纸经书则用文字系统记载了原生口传文化的大部分内容。其中，佛教文化（贝叶文化）作为次生型文化，经历了上千年的反复渗透、传播，从最初与作为傣族原生文化主干之原始宗教神灵信仰系统的对峙，到最终促成互相折中变通策略而得以融合并存，在未触动傣族原生文化根系的前提下，成功地在宗教文化、制度文化、伦理道德规范方面实现了整合与叠加。南传上座部佛教以整体统一的思想体系面目出现，对傣族地区因各各不同的寨神、勐神崇拜造成的信仰世界混乱、地区纷争不断的局面起到了有效震慑作用；佛教典籍、经书文字的大量使用及佛寺教育的相对普及，导致了傣族社会精神文化的分层——在满足、指导傣族群众日常生活所需的民俗文化遗产延续的同时，诸意识形态门类从混融于原始宗教思想的状态中逐步分离出来，并相应造就了佛谷、章哈（歌手，多为还俗僧侣）等文化精英阶层，使得以文字为工具的文化积累创造得以实现；佛教在“轮回”思想框架下宣扬的温顺内敛、积德行善观念，不仅为社会的稳定提供行为规范，也符合统治阶层驭民的现实要求，佛教徒的十等级划分更巧妙对应于统治政权的阶层分化，从而共同促进了封建领主制度在西双版纳傣族社会中的形成及稳固。以贝叶经为依托引入、传播的佛教及相应跟进的印度文化因子（如历法），使西双版纳傣族文化进入文化体系完备、社会组织健全有效、能够适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并满足傣族人民宗教、艺术审美、世俗生活礼仪需求的成熟阶段，直至20世纪中叶以前，第二次文化变迁的成功机制一直在发挥作用，巩固、充实着代表千余年来傣族文化发展成就的贝叶文化。据对贝叶经及绵纸经书的系统整理分类，涵盖了以下15个范畴：（1）哲学历史；（2）政治经济；（3）生产生活；（4）民情民俗；（5）文学艺术；（6）宗教信仰；（7）佛教经典；（8）天文历法；（9）法律法规；（10）礼仪章程；（11）伦理道德；（12）农田水利；（13）医药医理；（14）书画艺术；（15）建筑设计。[2]这足以说明贝叶文化是最能代表西双版纳傣族文化成就、文化特色的阶段。因此，有的学者以贝叶文化泛指西双版纳傣族传统文化。

第三次文化变迁则发生在 20 世纪中叶。此前,地理环境的独特、封闭、自成单元,历代封建统治者刻意营造的以贝叶文化为主体的文化隔离带,以及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完备成熟的的文化心态,一直是贝叶文化较少受到异文化冲击的主要原因。而导致西双版纳第三次文化变迁的原因则是:(1)制度变迁,打破了明清至民国土流并存局面,西双版纳被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行政架构,而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调适机制;(2)交通、通讯条件大为改善,与外界交往日益密切;(3)50 年代后,汉文化伴随国营农场、生产建设兵团、知识青年下乡等大量进入;(4)80 年代后,全球性普同文化亦即消费文化不断涌入。在第三次文化变迁中,又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解放初期,尊重傣族传统文化,并倡导社会主义文化新风尚,文化变迁属自发性、诱导性;(2)60 年代中期至文革期间,傣族传统文化尤其是宗教信仰遭受破坏,信仰世界虚空、精神文化有断裂之虞;(3)改革开放以来,执行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得到贯彻落实,传统文化在复兴的同时,又面临普同性文化的示范、冲击,文化变迁呈现出更加复杂的状况——既有主动式复兴,又有被动性变迁,但亦不乏主动性变迁的案例。

因此,当代西双版纳傣族文化作为复合型文化,是由原生文化(稻作文化、百越古俗文化、原始神灵信仰)、次生文化(贝叶文化,即南传上座部佛教文化)、再次生文化(全球性普同文化)叠加融合形成的,是三次重大文化变迁的产物。如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角度来划分,则原生文化及次生文化均属传统文化,而汉文化、全球性普同文化作为再次生文化属现代文化范畴。

二、贝叶文化对傣族文化变迁的启示

如上所述,贝叶文化阶段(即逾千年的第二次文化变迁)已完成了傣族文化的体系化、完备化进程。从公元 7、8 世纪至 13 世纪这一时期,随着叭真统一西双版纳各部落、建立统一的政权组织,统治地域包括今西双版纳、缅甸景栋地区、泰北清迈清莱地区、老挝、越南部分地区。南传佛教为全民所崇奉,以贝叶书写的经籍不仅宣讲了佛法教义,也吸纳了大量由经文记载下的傣族原生文化,成为这一时期傣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因为文化移植的成功总要以结合移入地现实情况的适当文化变形为前提,而西双版纳傣族僧众在辑录佛经时采取开放、宽容的态度,兼收佛说教理、民间俗信、乃至神佛争斗之事,正实现了佛教在淡化矛盾、安抚民众的基础上稳固己身地位的以退为进之策。从民歌谣、创世史诗、谚语、习俗歌到谷神崇拜、寨神勐神崇拜,以及 500 部叙事长诗和诗歌理论,均长期与南传佛教典籍、教义并存共荣于一体,在漫长历史时期的碰撞、排斥、吸纳、融合中,傣族文化达到内涵与外延的大为充实、扩展,由原生文化叠加上次生的南传佛教文化而整合为复合型的贝叶文化。傣族文化也藉此过程形成了成熟的、体系化的文化生态系统——以俗众的和承袭自先祖的生活文化为底蕴、统一的佛教信仰为社会组织协调手段及精神文化发展凭藉,具有了稳定、优越的文化心态和从容审慎的文化吸收协调功能,并形成应对异文化冲击、与封建领主政治经济相适应的内倾、封闭等若干趋向,达到了自然、社会与人的高度契合。

强调贝叶文化的成熟、系统,在于肯定傣族人民伟大的文化创造力,也旨在从中引以为鉴,剖析造成今日之西双版纳傣族文化变迁种种事象的根本原因。笔者以为,贝叶文化作为三次文化变迁中承上启下的阶段,其衍成、发展为探讨傣族文化变迁的规律提供了以下启示:

1. 文化变迁在初期时,本文化多表现出对异质文化的排斥、盲从、盲动,以既封闭自强又脆弱自卑的双重心态应对主动进入的强势文化,而异文化对本文化的必要尊重可为文化移入的契机,也是文化变迁最终得以完成的基本前提。南传佛教进入西双版纳经历了多次反复,因遭到了傣族原始宗教的强烈抵制而拉长了传入的时间跨度。傣文古籍《谈寨神勐神的由来》讲述了初近傣寨的传教僧人只敢自称作“野和尚”而在寨外山野间聚众说法的故事,最初传教的困难可见一斑。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的、与突出地域性特点的寨神勐神崇拜相一致

的内倾、自闭心理,以及对客观上较傣族原生文化更成熟完备的佛教文化所产生的自卑情绪,贯穿于南传上座部佛教传入的过程,通过如荣格所阐述的“反现”调协机制而表达为对佛教的反对,《谷魂奶奶的故事》即可视为这一复杂心态的生动表露。然而,两种信仰文化在崇信对象特点、现世生活态度等方面的截然不同既是引发抵触的症结,也潜藏着在对立比较中被对方补充吸收的机缘。佛教以扶危救难的言行打动人心后,傣族民众渐为其所吸引,于不自觉中改造着自己的信仰世界,以至衍出一段先祖叭桑木底与佛祖斗智斗法而最终败下阵来的传说。与此同时,佛教徒也认识到原始宗教作为傣族传统文化底蕴的深厚力量,改变了佛教在傣族地区的进入面目,对原始宗教采取改造加妥协策略,将原始宗教某些主张及仪礼整合到佛教教义中,终于获得立足之地,并很快上升为西双版纳傣族的全民宗教,继而促成其民族文化的转型。原生傣族文化在经历了最初的不适、恐慌之后转而谋求和谐共处,说明文化变迁并非一蹴而就,必须有一个文化接触、文化适应、相互选择吸纳的过程。

2. 文化变迁是一个渐融渐变的过程,经历的时间较为悠久。若以佛教文化与傣族原生文化的渗融叠加来界定贝叶文化,则其应算是肇始于公元3、4世纪佛教最初传入西双版纳之时。此后,佛教与傣族原始宗教反复冲撞磨合,历经近千年,到13世纪才在西双版纳扎根、15世纪方于德宏正式驻足,这一漫长的文化整合过程也正孕育、塑成了独特的贝叶文化。仅就西双版纳傣族而言,公元3、4世纪至13世纪是贝叶文化生成、转型期,13世纪至20世纪中叶为巩固、完善、成熟期,前后绵延了十几个世纪。

3. 历次文化变迁都只是以文化主流和某些结构层次为切入点及文化整合调适重点,并未发生整体动荡。文化人类学理论认为涵化也即文化接触及其导致的渐进的潜移默化式的变异是最为普遍的文化变迁规律,借取文化因子充实原有文化体系也较常见,而文化跃升、文化断裂则是特例。贝叶文化在生成、转型期,只是对傣族原始文化中有悖佛教教义、伦理道德的部分加以扬弃,以佛教教义来“化”傣族伦理道德,对作为傣族原生文化主干的原始宗教进行适度的改造、利用,并未触及及其保有的古越人生活习俗文化及稻作文化部分,反而使原生文化因傣文和贝叶经的创造使用而完成了文化形态的质的飞跃。

4. 文化变迁中,人对借入文化因子的主观选择是一个不可忽视因素,而这又是人类对现实生活的功利观照使然。第二次文化变迁形成的贝叶文化,既包括经佛教改造过的制度文化、宗教文化、伦理道德,也保留了大量实作性较强的原生生活文化内容,基本上形成佛教文化占据上层建筑而原生文化照顾现世物质生活的文化结构特点。佛教以统一的佛祖崇信为结束各勐割据纷争提供精神武器,以教阶对应于政权分层形成政教合一的社会统治模式,以修身行善则德被身后的因果训诫协调人际关系并释缓死亡恐惧,符合佛教传入时的傣族社会要求,且提供了较原生文化中相应文化形态强大得多的现实功能,其为傣家人所选择、整合到社会文化体系中本在情理之内。至于操作层面上的日常生活文化,传入的小乘佛教并未涉及,随其带进的异域文化亦因不适应当地文化生态环境而令效能大打折扣,所以,西双版纳傣族世代传承的仍是先民在长期生活积累中形成的应对类型化事件的行为与观念,即与日常生计活动相联系的原生文化内容,如祭谷神、树神、房神等。贝叶文化复合性特征的形成,既受到文化自身运转规律的作用,也不应排除讲求实用的功利驱力。

三、 结语

综合上述四点启示来反观当代西双版纳傣族文化变迁,可以看到:首先,傣族文化在50年来的种种变迁不一定是在成熟、理性的状态下发生的,而同样充满着排斥、盲从、盲动、自信与自卑相交织的心态,文化变迁作为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应有信心逐渐适应,逐步探索适合傣族社会发展的较佳途径。其次,对于正在进行的第三次文化变迁而言,50年的时间不短,但也不长,从文化史的经验鉴古知今,我们需要耐心和等待,不必急躁,理性的观察、比较、反省将有助于分析引导这一文化变迁过程。第三,文化变迁涉及主流部分,

作为贝叶文化核心的佛教文化,其文化精神是宗教人文精神,而现代文化崇尚的是科学技术,宗教文化的式微势所必然,因而必须处理好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长期并存、现代学校教育与寺庙教育的长期共存、双语文和多语文制度的推行等。在科学精神取代宗教人文精神成为西双版纳傣族文化主流的过程中,切忌冒进。再者,第三次文化变迁也只可能对贝叶文化的局部层面或结构进行置换、补充,而不可能触及稻作文化、傣族习俗文化这些民族文化的大根,传统文化的根系发达,今日仍可枝繁叶茂,而要跟上时代步伐,又必须吸纳新的文化特质,继续完善傣族文化,充分运用傣族业已成熟的文化适应、吸纳机制,“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以开放的、成熟的、博大的、机变的心态和文化机制去应对未来种种现代化进程中的撞击。最后,试以实用驱动原则对西双版纳傣族第三次文化变迁的部分面貌作大胆推测,结论是:应用科技文明将逐步置换掉原始信仰体系中的绝大部分神灵崇拜内容,近年来谷神、山神、水神、树神等神灵祭祀活动频度日稀的情况已初显其衰微之势,但体现基于地缘联系之上的民族自觉的寨神勐神崇拜(傣族俗语“没有寨神,寨不成寨,没有勐神,勐不成勐”),在全球生活方式趋同的背景条件下可能成为被激发的傣族意识的显性表征,因而还会在相当长时期内存续;经长期磨合而与地区民众心态与生活习惯形成默契的南传上座部佛教依然是人们宗教信仰的主要内容,虽在短期内可能受物质文明冲击而动摇地位,但人类对精神家园的追求终将引导傣族回归旧有信仰世界,而书写工具与社会形态的进步、现代学校教育制度及科学文化教育的推广,也使南传上座部佛教保存民族传统文化及以教兴政的功能淡出历史舞台,开始向其基本的信仰支持功能复归。

参考文献:

- [1] 岩峰,王松,刀保尧. 傣族文学史 [M].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5.
- [2] 岩温扁. 贝叶文化在建设民族文化大州中的地位 and 作用 [A]. 首届全国贝叶文化研讨会论文集 (上) [C]. 西双版纳民族研究所, 2001.

The Dai people's Three Time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ir Enlightenment in Xishuanbanna

Huang Ze, Hong Y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in Yunnan University; The Ideological Front Editorial Department in Yunnan University, Yunnan, Kunming, 650091)

Abstract: Xishuanbanna is one and only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the Dai people in our country. The Dai people with the Daile branch as its main body has settled here for above two thousand years. It has three times of cultural historical development: primary culture (the rice culture, the ancient Yue culture, the primitive religion culture), secondary culture (the Buddhism culture of Shanzuo Department spreading south), third culture (the Global culture). These kinds of culture have interfused and formed a multiple culture. And its cultural fusio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daptive mechanism have been the inscape of the Dai people in Xishuanbanna. Which will have an effect o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the Dai people; cultural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ultural adaptation

收稿日期: 2002-12-05

作者简介: 黄泽 (1964-), 男, 云南宣威人, 云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主要从事民族学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 邵平)